

历史的转调与滑音

——赵元任在 1919

袁一丹

1919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,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。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,对一个自信心、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,是不同寻常的。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、认同危机,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。

1919年是赵元任个人生命史上临近“翻篇儿”的时刻。

此时的赵元任仍游离于大历史之外。国内趋于白热化的新旧之争,《新青年》上以他的朋友胡适之为中心的文学革命,甚至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,在赵元任 1919 年的生活史中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从世界史的角度看,像一战结束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,在他心目中似乎还不及同年发生的某次天文奇观更有吸引力。

直到 1920 年,留滞美国近十年的赵元任决定回国,才正式步入历史的聚光灯下。1920 至 1921 年可以说是赵元任一生的“高光”时刻,也是他与国内知识界生出关涉、互动频密的两年。因罗素来华讲学,赵元任随行翻译,同时加入国语运动。但对他个人而言,更有意义的人生转折是解除包办婚约,与杨步伟结婚。

1919 年既是赵元任人生中一个晦暗不明的低谷期,又有什么值得追述的呢?他在《早年自传》中写道:

The Academic year 1918-1919 was one of my most unsettled and unsettling years within memory.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, where to go, geographically, nationally, intellectually, or emotionally. [1918-1919 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。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、去哪儿,无论在地域上、国族上,思想上或情感上,都无所适从之感。]

这段自述提供了一个入口,由此可窥见赵元任此时的心灵世界,吸引我探究这种多方面的不安定感(unsettled and unsettling)从何而来,又是如何得以化解的。

1918 年赵元任从哈佛哲学系毕业,1919 年恰是他在各种人生选择间犹豫不决的 gap year(空档年)。身心状态的波动起伏,令他暂时沦为精神上的“流浪汉”。在拿到雪尔登



赵元任在《早年自传》中写道:“1918-1919 学年在记忆中是我最不安定的年份之一。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、去哪儿,无论在地域上、国族上,思想上或情感上,都无所适从之感。”

旅行奖学金(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)后,赵元任开始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。《早年自传》中颇为细致地记录下他漫游途中一次乞食的经历:肩上扛一手杖,杖上挂一行囊,走到一处人家,跟女主人讨要面包和牛奶,说“让一个流浪汉也‘胡佛一把(Hooverize, 厉行节约之意)’”。女主人最后象征性地收了点钱,表示不是对流浪汉(tramp)的施舍。这种漫游、求乞,对赵元任而言,似乎是他化解不安定感的自我疗法。

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,已养成“冥游”的习惯。他喜欢边闲逛边放飞思绪,在路上碰到熟人老是忘记打招呼,看起来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(absent-minded professor),因而获得“教授”的外号。赵元任这种“心不在焉”的书生气质,与他的妻子杨步伟正好形成完美的性格互补。杨步伟属于杀伐决断的行动派,她在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(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)开头坦言:

我喜欢动作。我第一次碰见我美国留学生丈夫的时候,他还是那种一天到晚坐在那想事情的中国念书人样子,我虽然脚还没踏到美国地方,他一见我就说我简直像个美国人。我就是为着爱做事而做事。世界上该做的事那么多,你哪来工夫那么闲

坐着熬?[赵元任译:I like to move; I like to act. When I first met my American -educated husband, a typical contemplative Oriental, before I ever set foot on America, he said that I was a typical American. I want to do things just for the fun of doing them. There is too much to do in the world to sit around and waste your time.]

1919 年前后赵元任摇摆不定的精神状态,多少源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。他在 1916 年 11 月 3 日日记中写道:“I am 24 years old today, still a hesitator.”“hesitator(彷徨者)”

道出了赵元任求学时期的性格底色。1918 年 5 月他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,答辩委员会主席霍金教授(William E. Hocking)追问写这篇论文(《连续性:方法论的研究》)对他的性格有无帮助?赵元任老实回答说,无助于克服自己优柔寡断的毛病。

这种不安定的心理状态,对一个自信心、自制力极强的学者而言,是不同寻常的。其间隐伏着赵元任个人独有的精神危机、认同危机,与胡适归国前的踌躇满志形成有趣的对照。胡适在归国前已有明确的自我定位,就是要做国人导师,他常引纽曼(Newman)的一句诗:“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/ now that were are back. [现在我们回来了,你们请看,便不同了!]

赵元任是现代学者当中特别注重保全日常性的一个人。早年随祖父各地迁徙、出国后四处游历、战乱期间流离失所,这些经历都让他格外珍视平常过日子的滋味。《赵元任早年自传》中但凡涉及大的历史变动,常滑向个人生活常态的记述。就像七七事变后的某个晚上,赵元任跟文教界的几位朋友在南京一家面馆吃面,静静地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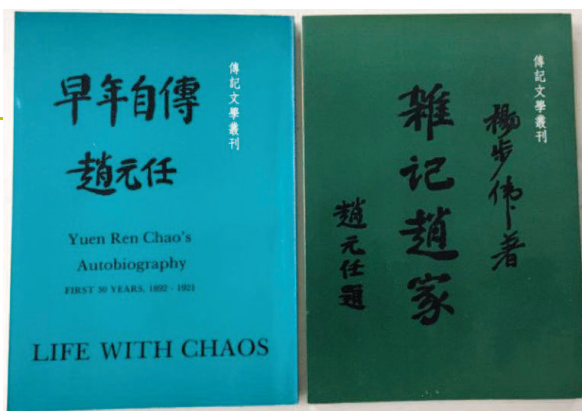
着月亮在云层间穿过,都沉默不语。赵元任感叹:不知何时我们能再有这样的一个夜晚(I wonder how often we shall be able to enjoy this kind of evening again)。所谓平常过日子的滋味,只有在聚散离合的战乱年代,才是值得回味的稀罕物。

1927 年两人共同的好友韦莲司(E. C. Williams)写信给胡适说:

我觉得世间最忽略的资源就是嬉戏,要能够在社会上撑得住,没有比嬉戏更重要了。不是指声色犬马,或神经兮兮的寻乐,而是真正轻松忘我地让想象力奔驰,表现自己另外的一面。赵元任无论在任何困境都不会令人觉得他可怜,因为他能随时以嬉戏的心态从中获得乐趣。(参见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: The Half-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& Edith Clifford Williams, Hong Kong: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2009)

不得不说韦莲司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二人心性上的差异,赵元任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,都能保持“嬉戏”的心态,而这恰是作为公众人物,难以摆脱盛名之累的胡适所缺乏的。这种嬉戏的精神渗透到赵元任生活的方方面面,在他最钟情的语言学和音乐创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在嬉戏精神的引领下,语言学不再是枯燥的专业,音乐也不仅是业余的消遣,二者都成为赵元任生命中的光与热。

赵元任这种“嬉戏”的精神状态,也是近代中国过分紧张的学术社会所缺乏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赵元任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“异端”,我感兴趣的是这种“嬉戏”的心态(play with something)与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现代语言学之间的张力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



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4 年初版赵元任《早年自传》和杨步伟《杂记赵家》